



书志》仅保存了它的梗概。然而，此后《甘石星经》在流传中有着越来越多的版本。如元朝末年陶宗仪的《说郛》中收录的；还有明崇祯中期毛晋的《津逮秘书》本，由毛晋收录并刻印，又名汲古阁本；此外还有《五朝小说》《道藏义》等也收录此书。这些版本都称《甘石星经》为《星经》或《通占大象历星经》，虽然各种版本卷数有多有寡，但内容都完全相同，附有的星座图形也相似，只是次序互有先后，这些版本应当同出一源，源于原本《甘石星经》。

通过流传版本以及相关古代天文资料保存的内容可知，《甘石星经》以甘德、石申两人记录的关于宇宙星系变化情况为主要内容，反映了战国时代天文学成就，是世界上最早成书的恒星和行星的观测记录。《甘石星经》中的《甘石星表》最早记录了恒星变化位置图表，石氏部分包括二十八星宿、中官与外官；甘氏部分则系统记录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大行星的运行，发现了五大行星的出没规律，记载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，测定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方位。如《甘石星经》称北斗星为北斗七星，视为天帝的星君，“北斗星谓之七政，天之诸侯，亦为帝车。魁四星为璇玑，杓三星为玉冲，齐七政，斗为人君号令之。主出号施令，布政天中，临制四方”。

当然，中国古代的天文记载更多的是运用其来占卜，《甘石星经》中的关于天文、天象记载也不例外，具有历史局限性。如对于北斗七星的记载明显附有占卜之意，“守斗西，大饥，人相食。守斗南，五果不成。五星入斗，中国易政，又易主，大乱也。彗孛入斗中，天下陕，主有大戮，先举兵者咎，后举兵者昌。其国主大灾，甚于彗之祸”。显然从记载来看，关于北斗七星位置转辗赋予更多国家时运的预测，这里也涉及了彗星。事实上，这种通过天象变化占卜国运的文化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，成为生产力极不发达情况下的一种特有文化方式，如西汉诸帝还好言谶纬，将一些天文现象牵强附会，妄言兴衰，宋代禁止流传，纬书中也保存有春秋战国时的天文资料。

《甘石星经》中的《甘石星表》所载星座的测量形式，是中国天文测量学上独特的赤道坐标系。这个星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，比希腊天文学家伊也谷测编的欧洲第一恒星表大约早二百年，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、月、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，都要用到《甘石星经》的数据。《甘石星经》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高度，同时也影响到当时的政治、文化生活。秦始皇造阿房宫和建造骊山陵墓，就采用了天文学的知识，两座建筑上具天文下具地理。西汉惠帝元年重修长乐宫，将城垣提高三丈，“城南为南斗形，北为北斗形，至今人呼汉旧京城为斗城”。在西汉陵墓壁画中也有相当精彩的星象图，最有名的是河南洛阳西北郊西汉墓中的壁画天文图。

春秋时期的天文成就由此奠定了中国天文学的基础，影响深远，“其巫咸、甘、石之说，后代所宗。暴秦燔书，六经残灭，天官星占，存而不毁。及汉景武之际，司马谈父子继为史官，著《天官书》，以明天人之道。其后中垒校尉刘向，广《洪范》灾条，作《皇极论》，以参往之行事。及班固叙汉史，马续述《天文》，而蔡邕、渔周各有撰录，司马彪采之，以继前志。今详众说，以著于篇”。显然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成就中当属《甘石星经》最大，同时该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以牛耕、铁器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不断发展，集中反映到政治文化上来，尤其在文化上体现出了百家争鸣的盛世景象，而天文学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，并由此奠定了中国古代在世界天文史上的地位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天官书》中指出：“昔之传天数者：高辛之前，重、黎；于唐、虞，羲、和；有夏，昆吾；殷商，巫咸；周室，史佚、苾弘；于宋，子韦；郑则裨灶；在齐，甘公；楚，唐昧；赵，尹皋；魏，石申。”其中，齐国的甘公及魏国的石申，就是战国时代两大天文学家。对此，《晋书》有着同样记载，“其诸侯之史，则曾有梓慎，晋有卜偃，郑有裨灶，宋有子韦，齐有甘德，楚有唐昧，赵有尹皋，魏有石申夫，皆掌著天文，各论图验。”这里的甘德就是《史记》中提到的甘公。

因年代过于久远，关于甘德的属国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与争议，其中《史记·天官书》记载甘德为齐人，刘宋裴骃在《史记集解》中记录为鲁人，《史记正义》则提出为楚人，并由《汉书》和《三国志》沿用，称其为楚人。由《汉书·律历志》将两人的天文著作合为一书，并在南宋晁公武的《郡斋读书志》中正式命名为《甘石星经》。其中，甘德写有《天文星占》八卷，石申写有《天文》八卷。

该书在历史流传过程中也是命运多舛，历代屡有篡改增删，现存民间流传的抄本已不是原文。原书词意较浅，也很简略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记载这部书有各八卷，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只有各一卷，到唐以后此书就完全散佚了，仅在唐代天文学著作《开元占经》中保有一些片段，现传版本大都由唐代人据拾破残旧本，缀补而成，但到南宋晁公武的《郡斋读

史志》仅保存了它的梗概。然而，此后《甘石星经》在流传中有着越来越多的版本。如元朝末年陶宗仪的《说郛》中收录的；还有明崇祯中期毛晋的《津逮秘书》本，由毛晋收录并刻印，又名汲古阁本；此外还有《五朝小说》《道藏义》等也收录此书。这些版本都称《甘石星经》为《星经》或《通占大象历星经》，虽然各种版本卷数有多有寡，但内容都完全相同，附有的星座图形也相似，只是次序互有先后，这些版本应当同出一源，源于原本《甘石星经》。

通过流传版本以及相关古代天文资料保存的内容可知，《甘石星经》以甘德、石申两人记录的关于宇宙星系变化情况为主要内容，反映了战国时代天文学成就，是世界上最早成书的恒星和行星的观测记录。《甘石星经》中的《甘石星表》最早记录了恒星变化位置图表，石氏部分包括二十八星宿、中官与外官；甘氏部分则系统记录了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大行星的运行，发现了五大行星的出没规律，记载了八百颗恒星的名字，测定了一百二十颗恒星的方位。如《甘石星经》称北斗星为北斗七星，视为天帝的星君，“北斗星谓之七政，天之诸侯，亦为帝车。魁四星为璇玑，杓三星为玉冲，齐七政，斗为人君号令之。主出号施令，布政天中，临制四方”。

当然，中国古代的天文记载更多的是运用其来占卜，《甘石星经》中的关于天文、天象记载也不例外，具有历史局限性。如对于北斗七星的记载明显附有占卜之意，“守斗西，大饥，人相食。守斗南，五果不成。五星入斗，中国易政，又易主，大乱也。彗孛入斗中，天下陕，主有大戮，先举兵者咎，后举兵者昌。其国主大灾，甚于彗之祸”。显然从记载来看，关于北斗七星位置转辗赋予更多国家时运的预测，这里也涉及了彗星。事实上，这种通过天象变化占卜国运的文化在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，成为生产力极不发达情况下的一种特有文化方式，如西汉诸帝还好言谶纬，将一些天文现象牵强附会，妄言兴衰，宋代禁止流传，纬书中也保存有春秋战国时的天文资料。

《甘石星经》中的《甘石星表》所载星座的测量形式，是中国天文测量学上独特的赤道坐标系。这个星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星表，比希腊天文学家伊也谷测编的欧洲第一恒星表大约早二百年，后世许多天文学家在测量日、月、行星的位置和运动时，都要用到《甘石星经》的数据。《甘石星经》标志着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高度，同时也影响到当时的政治、文化生活。秦始皇造阿房宫和建造骊山陵墓，就采用了天文学的知识，两座建筑上具天文下具地理。西汉惠帝元年重修长乐宫，将城垣提高三丈，“城南为南斗形，北为北斗形，至今人呼汉旧京城为斗城”。在西汉陵墓壁画中也有相当精彩的星象图，最有名的是河南洛阳西北郊西汉墓中的壁画天文图。

春秋时期的天文成就由此奠定了中国天文学的基础，影响深远，“其巫咸、甘、石之说，后代所宗。暴秦燔书，六经残灭，天官星占，存而不毁。及汉景武之际，司马谈父子继为史官，著《天官书》，以明天人之道。其后中垒校尉刘向，广《洪范》灾条，作《皇极论》，以参往之行事。及班固叙汉史，马续述《天文》，而蔡邕、渔周各有撰录，司马彪采之，以继前志。今详众说，以著于篇”。显然，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成就中当属《甘石星经》最大，同时该书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天文学著作。



《诗经》中的家与国

□ 潘志宏

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:保家卫国、勤政爱民的为国情怀

《诗经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，也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生命起点。它保存和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首，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，历时约500多年的社会面貌。《诗经》中有大量诗歌，集中体现诗人与百姓的家国情怀。《论语·阳货》记载，孔子说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?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。其中的“兴观群怨”指的就是《诗经》治国兴邦的四种社会功能，折射出先秦时期家国之间的特殊关系。

悠悠苍天,曷其有所:厌恶征役、思乡恋亲的家庭牵挂

厌恶征役，痛恨战争。周时频繁的战争与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，百姓因为王事四处奔波，常年不能回家。《诗经》的很多诗篇表达诗人对征役、王事的厌恶痛恨，对家乡亲人的思念愁绪。如《小雅·采薇》中说，“王事靡盬，不遑启处。忧心孔疚，我行不来!”诗人由于王事没有休止，很难得到休息，因此心情非常苦闷，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到家中。诗中的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”生动形象地对比了上战场前与服役归来后的情景和心境，成为千古佳句。《小雅·何草不黄》是描写征夫艰苦辛劳、对征役怨恨不满的一首怨诗，“何草不玄?何人不矜?哀我征夫，独为匪民”。诗中多用反问句，控诉了征夫所遭受的非人待遇，强烈抗议被统治者虐待和轻视。“哀我征夫，朝夕不暇”，征夫因为常年在外忙碌，既愤怒又痛苦，只能以诗歌来宣泄厌恶征役之情。朱熹说：“周室将亡，征役不息，行者苦之，故作此诗”，周时诸侯国之间互相侵凌掠夺、征役过重，导致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破坏。

思念亲人，怀想故土。《唐风·鸛羽》记载，“王事靡盬，不能蓺稷黍，父母何怙?悠悠苍天，曷其有所?”徭役没有休止，人民不能耕作，家中田园荒芜，无法赡养父母。诗人控诉了繁重王事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和负担，他悲伤无奈，只能高声呼问苍天，何时才能过上正常的生活，吐露心中的愤懑与对亲人的牵挂。在《邶风·击鼓》中同样描写了一位士兵远征他国、思归不得的厌战思乡之情。战争使战士和无辜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人们流离失所、家破人亡。战士们想起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爱情誓言，对爱人的惦念、无奈与苦楚，所以从内心发出了“于嗟阔兮，不我活兮。于嗟洵兮，不我信兮”的哀号。《诗经》中的征役诗从侧面反映了那个战乱不断、多灾多难的时代，以及征役给百姓、士兵们带来的痛苦，将周人对徭役的排斥、对家庭的渴望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征夫思念亲人与牵挂故土之情愈发浓厚。

保家卫国，同仇敌忾。《诗经》中保家卫国、歌颂战功、夸耀将士的战争诗歌，不仅展现出保家卫国、同仇敌忾的磅礴气概及雄浑壮丽的文学色彩，也折射出统治阶级的审美需求和意识形态，蕴含着爱国爱民、建功立业的爱国情怀。《秦风·无衣》是秦地的一首军中战歌，记录了秦军奉周王之命抵抗犬戎的事件。“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。”诗中充满了慷慨激昂、豪迈乐观、团结互助的精神气概，“王于兴师，修我戈矛。与子同仇!”诗共三章，采用重叠复沓的形式，但是在内容和情感上不断递进发展，展现秦人尚武好勇、英勇抗敌的英雄主义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。《小雅·出车》记录一位战士跟随大将南仲出征并凯旋的历史。“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。出车彭彭，旂旐央央。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赫赫南仲，玁狁于襄。”此诗赞扬赫赫有名的南仲所立下的战功，同时呈现出诗人在战争中的艰难困苦、战争胜利后的激动心情，抒发积极参战、团结御侮的爱国豪情。《诗经》中战争题材的诗歌多通过激昂文辞来烘托雄壮军威、兵强马壮，饱含战士们勇敢御敌、团结乐观、斗志昂扬的精神。

勤于政事，爱国爱民。《大雅·文王》用赋的手法称赞周文王建立周邦、亲政爱民的功绩。《小雅·采芣》记录一位战士跟随大将南仲出征并凯旋的历史。“王命南仲，往城于方。出车彭彭，旂旐央央。天子命我，城彼朔方。赫赫南仲，玁狁于襄。”此诗赞扬赫赫有名的南仲所立下的战功，同时呈现出诗人在战争中的艰难困苦、战争胜利后的激动心情，抒发积极参战、团结御侮的爱国豪情。《诗经》中战争题材的诗歌多通过激昂文辞来烘托雄壮军威、兵强马壮，饱含战士们勇敢御敌、团结乐观、斗志昂扬的精神。

彼君子兮,不素餐兮:讽喻政治、忧国忧民的家国理想

讽喻政治，揭露罪行。《诗经》中的政治讽喻诗，主要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残暴的罪行，批评当权者排斥贤良、听信谗言、嫉贤妒能，反映西周后期到东周初年间，政治

黑暗，君臣无道，导致国家危机四伏、百姓怨声载道、苦不堪言。如《小雅·小旻》讽刺周幽王昏庸无能、腐败误国，“旻天疾威，敷于下土。谋犹回遹，何日斯沮?”由于君主施行的邪僻政策，把国家逐渐推向了灭亡，诗人痛心疾首，所以对国家将亡感到“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，既有对昏君的无可奈何，也有对国家深沉的爱。这一时期出现了揭露封建统治阶级贪婪凶残的讽喻诗，《魏风·伐檀》讽刺统治者剥削百姓，“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?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貆兮?”用反诘的方式责问统治者为何不劳而获，“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!”讥讽这些贵族们只不过是吃闲饭的寄生虫而已。《魏风·硕鼠》形象地把剥削者比喻成贪婪狡诈的肥大老鼠，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!三岁贯女，莫我肯顾。”只顾自己享受，不顾百姓死活。这类诗歌鲜明地指出当时的阶级矛盾，贵族与百姓贫富差距悬殊。诗歌的作者敢于直言讽刺君王的昏庸无道、佞臣的自私暴戾，倾吐百姓的怨愤和痛苦，寄希望于统治者能够从善如流、改变现状。

忧国忧民，感时伤怀。《诗经》中还有一类怀念故国、忧国忧民的诗歌，诗人触景伤情、痛惜亡国。《王风·黍离》是一位亡国大臣有感于国家兴亡所作的诗歌。他看到故国宗庙已经长满庄稼，心中无限悲怆。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;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。”对故国的追思和感慨，如疾风骤雨，让诗人悲痛不已，只能追问“悠悠苍天，此何人哉?”用重叠句和反问句，回环反复地吟唱，委婉悲怆地表达了对周幽王的批评。故国之思与悲痛之心，显露无遗。《曹风·下泉》写了曹国之臣感叹周王室衰败，因而忧思怀念周王朝强盛时期。诗人从受寒泉浸泡的野草起兴，比喻诸侯国以强凌弱，小国没有地位和安全，所以“忼我寤叹，念彼周京”。梦中醒来，忧愁叹息无法入眠，昔日周王朝盛世仿佛还在眼前。“芄芃黍苗，阴雨膏之。四国有王，邠伯劳之。”诸侯国的安定是由于周王的庇护，就像不苗的茁壮是由于雨水的灌溉。作者怀想周初的强大，忧国忧民之情呼之欲出。

司马迁认为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”。《诗经》反映了战争与徭役、压迫与反抗、政治与社会等家国关系的方方面面，可谓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。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，诗人对亲人的牵挂、对故土的留恋、对国家的热爱，表达出百姓对和平安定的渴望与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建构起饱满立体的家国情怀，暗藏着对时代的深刻同情与反思。

古典文学中的家国情怀

讽喻政治，揭露罪行。《诗经》中的政治讽喻诗，主要揭露了统治阶级荒淫残暴的罪行，批评当权者排斥贤良、听信谗言、嫉贤妒能，反映西周后期到东周初年间，政治

的任务挑战，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，才能“任凭风浪起，稳坐钓鱼台”。

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必由之路。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，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，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、改革开放考验、市场经济考验、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，精神懈怠危险、能力不足危险、脱离群众危险、消极

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。只有做到“三个务必”，才能坚定不移推进党的伟大自我革命，实现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，更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，在新征程中不断攻克一个又一个堡垒、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。

开辟事业发展新天地的现实保障。百年来，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风骨品质已深深融入党的基因血脉，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“我自岿然不动”，这是我们未来牢

牢掌握历史主动的强大力量。新的赶考之路上，我们党面临的“考场”越来越大、“考题”越来越难、“答题条件”越来越难以预料。只有做到“三个务必”，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、世界之问、人民之问、时代之问，才能全力战胜前进道路上各种困难和挑战，才能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、行稳致远。

(作者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、公安厅厅长)

历史文化典籍

(上接1版) 深刻把握“三个务必”的重大意义

时代考卷常出常新，赶考永远在路上。在新的历史方位上，唯有做到“三个务必”，才能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夺取新胜利、创造新辉煌，努力交出无愧于时代、无愧于人民的优异答卷。

体现当今百年变局的深刻洞察。船到中流浪更急，人到半山路更陡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，前途光明、任重道远。当前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，世界之变、时代之变、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。如果缺乏忧患意识、底线思维，不能做到居安思危、未雨绸缪，就难以战胜各种风险挑战，难以领导人民不断前进。只有做到“三个务必”，才能深刻洞察面临